



主编 • 程必定

ZHONGGUO
GAIGE KAIFANG
DE TUPOKOU

中国改革开放的

Z h o n g g u o G a i g e k a i f a n g D e T u p o k ou

突破口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改革开放的

突破口

主编 ● 程必定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程必定,黄书元主编; 刘良琼等撰.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6

ISBN 7-5336-2414-9

I . 中... II . ①程... ②黄... ③刘... III . ①体制
改革 - 研究 - 中国 ②对外开放 - 研究 - 中国 IV .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449 号

责任编辑: 黄书元 装帧设计: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中 国 改 革

Z h o n g g u o g u i

开 放 改 革 突 破 口

Kāi fàng gǎi gé tū pò kǒu

改革的突破口

Tuǐ bù kǒu

前　　言

(一)

人类历史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人们不会忘记,在这个世纪的第一年,即 1900 年 4 月,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中国,不久,腐败没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沦为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将会看到,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即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政府收回澳门主权,继香港之后澳门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彻底洗刷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深深沉积的民族耻辱,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世人皆知,当 20 世纪刚刚过去一半的时候,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 20 世纪中国巨变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由贫穷、耻辱走上繁荣强大的新纪元。20 世纪中国激荡的百年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只有富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国的富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别无选择。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业,却没有现成的答案。建国初期,以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国家的各项经济及社会建设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以至于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路线以后，我们的国家才真正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1978年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到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9553亿元，约9630亿美元，经济总值居世界第七位；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7%，是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高6.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出近8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2个百分点，是全世界持续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唯一国家。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1998年进出口总额达3240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外汇储备14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旅游业外汇收入126亿美元，居世界第八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3600亿美元，其中1998年58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1978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成倍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人民币提高到1998年的2160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7.8%；城镇居民收入由1978年的343.1元人民币提高到1998年的5425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5.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由1978年的21.92元人民币提高到1998年的4299元，年均增长30.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人民币提高到1998年的27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1%，中国人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相当一部分

家庭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这些数据或许是枯燥的,但却是沉甸甸的,每个数据都是中华崛起的音符和乐章,每一个数据都饱含着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和辉煌成果!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有许多历史的闪光点,其中最有革命意义的,是对传统观念、传统体制的一次次冲击,以及在这冲击中建立起新的体制和新的观念,对此人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即将告别20世纪、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大庆之际,我们编写此书,回顾这些已成为过去但却影响深远,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口”,通过了解这些“突破口”的缘起、发展和深远影响,意在进一步激发和弘扬改革精神,迎接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

(二)

两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这一理想的实践模式,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实施,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缺陷渐渐暴露出来,在一个时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短缺经济等,几乎成了计划经济的代名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为这些问题深深苦恼。20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由于国情不同,改革的道路和方法不同,改革的成效也不同。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导致了国家的瓦解和社会制度的剧变,而中国的改革却走向成功,步步接近预定的目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世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从方法论上作出种种评价,“先易后难”论者有之,“自下而上”论者有

之，“渐进式改革”论者也有之。实际上，这些评价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认为，纵观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从方法论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再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然后从政策法律上规范，再向全国推开。概括地说，这就是“试验——立论——规范”的改革“三部曲”。可以说，中国每一项成功的改革都扎实地走着这“三部曲”，经历过从试验到立论再到规范这三个密切联系、逐步深化、日臻完善的演变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一个“改革周期”，对于一个具体的改革项目来说，一个“改革周期”大体需要3~5年的时间。如农业生产责任制，从1979年实行“农村大包干”的试验，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全面肯定、推广，大体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

上述三个阶段中，试验是改革的起点阶段，对改革的成败起着基础性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重视改革的试验，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章法还要从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①，就体现了对改革试验和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比如建立经济特区，要不要建，怎样建，先不要论定姓“资”姓“社”，更不去框定应该这样办，不应该那样办，而是先试验，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评价试验结果，解决要不要建的问题；用是否既符合国情、又适应国际规范的标准评价试验办法，解决怎样建的问题。试验结果表明，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建经济特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能建好经济特区。这样，经济特区从试验逐步走向成熟，大大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的试验，实际上是对旧观念、旧思想、旧体制的突破，

^① 以上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113、130、1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所试验的项目和内容，就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中国，由于旧观念、旧习惯、旧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对试验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并不容易。这里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又要防止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突破”就是要打破旧体制，必然涉及到权力、利益的调整，“试验”就是要建立新体制，必然涉及到观念、思想层次的革命。面临各种复杂局面和重重障碍，改革试验的选择和关键环节的突破，不仅要有善于开拓的智慧，而且还要有敢为人先的胆略。一个试验在突破上的成败，已经超过了试验本身的价值，对改革开放大局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书描述的 21 个具有首创意义的突破口事件，无一不充满艰辛的探索、思想的交锋，无一不对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大大小小的突破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长河”激流中的一个个导路的“石头”。摸着这些石头过河，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才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就。

(三)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空前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改革的宏大目标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刚刚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虽已基本建立，但形成健全的法制、有效的机制还需一段很长的时间；国有企业的改革虽步步深入，但减员增效的压力还很重，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我们的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也会不断发生。面向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正迅猛推进，知识经济在全世界也悄然兴起，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也在向全球蔓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预示：充满希望和生机的21世纪将并不平静。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新一轮世界竞争角逐中如何争取到主动地位，乃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世纪性的新课题。

面临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以高昂的斗志、坚定的信心和科学的态度，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为中国迈向21世纪探明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注入了豪情。这是中国20世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21世纪新发展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动力。在改革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在21世纪将会获取一个又一个新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也将会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程必定

1999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于无声处听惊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后	1
开启知识的闸门 ——恢复统一高考的决策经过和深远影响	25
春风化雨润心田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经过	38
亿万农民的伟大壮举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兴起	55
第一生产力的解放 ——科技体制改革的辉煌历程	74

从异军突起到半壁江山	
——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村社会转型	86
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发展	104
好风借力上青云	
——“三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116
春风吹又生	
——私营经济的勃兴与发展	129
构筑利益共同体	
——“北京天桥第一股”与中国股份制经济	142
在希望的田野上	
——从废社设乡到村民自治	157
一个创造性的构想	
——“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	171
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股份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184
建造中国企业的“航空母舰”	
——中国企业集团的诞生与发展	204

活化现代经济的血液	
——交通银行的重建与中国银行商业化	220
惊险的跳跃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及影响	234
开辟商品交易的新天地	
——中国期货第一市及其效应	245
涅槃后的新生	
——中国企业破产制度的形成和实践	263
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轨迹	278
从“人治”走向“法治”	
——翻开依法治国的新篇章	292
为有广厦千万间	
——住房制度改革的前前后后	310
后记	
	325

于无声处听惊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发表前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全中国。介入这场讨论的，不仅有理论工作者，而且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且最终形成了一场波及党政军民学各界，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党组织先后表态的思想论争。就某一个基本的哲学观点而进行的讨论竟能出现如此盛况，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篇文章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激荡起一场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思想解放运动呢？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呢？

马克思说得好：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还是让我们从 20 年前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标准”理论的迫切需要说起。

一 “两个凡是”设置禁区

“消灭四害，人心大快！”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的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人们从心里企盼着尽快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使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把国家建设好。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却提出“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推行一条维护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路线，即“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1977 年 2 月 7 日，中央“两报一刊”^①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地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两个凡是”规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个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在当时，“两个凡是”很有影响。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的思想处于僵化状态，觉得毛主席的任何思想和决策都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都是应该维护和遵循的。还有些人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受益者，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维护毛主席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和决策。

“两个凡是”的方针，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仍然被置于“文革”的阴影之中。人们以高昂的情绪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但一涉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面临“禁区”，不得不退避三舍、绕道而行。

^① “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就连《红旗》杂志准备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的重要“代表作”——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也不被批准。1977年2月4日，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竟在《红旗》杂志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另外，据当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的汪子嵩回忆，当时只要《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编辑部总要收到许多持反对意见的来信。反对的根据大多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一句话，而且许多实际上是被“四人帮”篡改了的话。

思想的藩篱，势必导致行动的禁区。当时，“文革”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而这些案件中的特别重大者，如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的冤案，以及所谓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人叛徒集团大案”等，都是经过毛主席同意而定性的。1976年清明节，首都人民为怀念周总理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也是经过毛主席而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的。坚持“两个凡是”，就谈不上为这些案件平反。而且，“文革”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历史使命，而不冲破“两个凡是”，就只能坚持毛主席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路线，就无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因此，冲破“两个凡是”，是解放人们思想的迫切需要，是使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迫切需要！

首先站出来否定“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